



四川省图书出版重点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 及其实践研究

Sinicization of Marxism's
“Three-Dimensional Rural”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Research

张晓雯 著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

历来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

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整体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品质指引下，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

是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共产党人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

四川省图书出版重点规划项目

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 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

Sinicization of Marxism's
“Three-Dimensional Rural”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Research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张晓雯著. —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504-0256-0

I. ①马…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理论研究②农业经济—研究—中国③农村经济—研究—中国 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A811.66②F32③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2933号

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

张晓雯 著

责任编辑:张明星 李 才

封面设计:杨红鹰

责任印制:封俊川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55号)
网 址	http://www.bookcj.com
电子邮件	bookcj@foxmail.com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0
字 数	325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504-0256-0
定 价	48.00元

1.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2.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序 言

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现代化道路

——读《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有感

—

我认真读过张晓雯女士的力作《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了。该书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三农”现代化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视野中，勾画了从马克思经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三农”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and 理论发展过程。张晓雯女士以极大的勇气和韧劲，在60年曲曲折折的“三农”现代化实践过程中寻找前进的方向，在烟波浩淼的“三农”现代化理论发展中抽象接近真理的轨迹。从作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不同历史时期中共历代领导人的“三农”理论虽有差异之处，但在理论源泉和理论品质上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三农”的理论，既是形成中共四代领导人“三农”理论的思想源泉，也是指导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基础。他们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是根据不同历史阶段实践的需要，对马列主义“三农”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与时俱进理论的充分体现。当然，这些理论的运用和发展，既有成功的探索，也有失败的教训，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①。前者固然令我们倍感欣慰和鼓舞，后者也不失有益的启示，蕴含着一定历史时期中共历代领导人对于“三农”问题的认识所能达到的高度，是探究不同历史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4。

时期我国“三农”政策演变原因的重要理论基点和认识来源，将有助于我们在新的发展水平和新的发展环境下，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实现农业全面发展、农村日益繁荣、农民更加富裕的目标和任务。张晓雯女士为我们贡献了一部高屋建瓴的作品。

近些年来，“三农”研究有一种现象：不少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三农”现代化是失败的，邓小平时代的“三农”现代化是成功的，“习惯性”地将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立起来，把毛泽东时代的“三农”现代化实践和理论探索打上马克思主义的记号，连同马克思一起抛弃；把邓小平以来的“三农”现代化实践和理论探索打上非马克思主义的记号，作为对毛泽东、马克思批判的依据。张晓雯女士《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和逻辑的力量推倒了上述建立在意识形态斗争基础上的偏见。《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是近些年来研究“三农”问题难得一见的超越意识形态的书。

张晓雯女士并不属于“三农”圈子的学者，她对中国“三农”学界的山头门派或许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是一本没有“江湖气”的书。

我读过一些关于“三农”研究的书，很少有与作者对话的愿望。但读过张晓雯女士的《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之后，有与之对话的强烈冲动。

二

从马克思时代开始，探索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一直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任务之一。

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一直存在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在资本力量的作用下通过消灭小农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一是在小农合作力量的作用下通过小农组织化实现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选择了扶持小农合作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道路。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选择了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以小农家庭经营为主、统分结合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道路。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公司+农户”兴起的时候，1993年3月邓小平告诫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

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①邓小平“第二个飞跃”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似乎又回到了毛泽东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上来了。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三农”现代化是否会走上“第二个飞跃”之路呢？

从1949年到1978年是第一个30年，从1979年到2009年是第二个30年。两个30年，河东走过，河西也走过，现在走到了三岔口。

三

吃饭问题大于天。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中国人吃饱饭。毫无疑问，追求农产品产量的增长是毛泽东时代农业发展的首要目标。粮食是百业之基础，只有粮食多了，肉、蛋、奶等才会多起来。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粮食只能靠自己生产，因此，毛泽东时代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必须服从“以粮为纲”的战略目标。

如何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呢？

“基础设施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粮食产量。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没有水利等基础设施这个基础，“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对粮食产量的增长只能事倍功半。

基础设施建设必须从水利建设抓起。

在重工业还不发达的毛泽东时代，如何迅速把以水利建设为核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搞上去呢？当然只能靠人海战术。因此，在毛泽东时代，大搞以水利建设为核心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是不可逾越的。

技术进步是追求粮食产量增长的重要条件。在毛泽东时代，动员大量的技术干部和农业高校下乡，培养大量的“社来社去”农业技术员，农业技术试验站和推广站建到了村社，大规模的改良品种和新品种推广，有限的外汇引进技术和设备建设化肥厂和农药厂等，都是“以粮为纲”的必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5。

然选择。

从1978年开始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验，极大地发挥了农民的主体性作用，增产效果明显。1981年全国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3年的时间，即在1984年就出现了大面积的“卖粮难”现象。

自1984年出现粮食“过剩”之后，在“统购统销”制度之外“自然长出”了市场交换，农民主体性进一步得到发挥，养殖业等多种经营便迅速发展起来，各种各样的农产品开始丰富起来了。农村的市场交换越来越火，市场一方面进一步促进了“统购统销”之外的生产发展，另一方面大幅增加了农民和集体的“计划外”收入，农民爆发出的旺盛消费需求拉动了投资，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也快速发展起来了。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四

从1985年开始，中国农业由农产品短缺阶段（第一阶段）进入农产品供需平衡阶段（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的农业特点是增产和增收同步，第二阶段的农业特点是增产往往不增收、甚至减收。第一阶段的农业以追求产量增长为第一目标，第二阶段的农业应该以追求农产品价格稳定增长为第一目标。

第一阶段的农业政策要点是“基础设施密集+技术密集+劳动密集”，第二阶段的农业政策要点应该是“技术密集+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

在农业发展的第二阶段，技术密集主要是以替代劳动的技术、提高农产品品质和附加值的技术为主。而“组织密集”是追求价格增长收益的核心。因为没有“组织密集”，小农既不可能在市场上获得农产品的议价权收益，也不可能获得农业产业化及其农产品附加值收益。“资金密集”和“品牌密集”是小农组织化后获得农产品价格增长收益的重要条件。

在农业发展的第二阶段，“组织密集”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主要有三种：一是“公司+农户”；二是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性村社农民组织；三是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综合性村社农民组织。在第二阶段选择哪种“组织密集”的形式为好呢？我们撇开道路和路线等意识形态问题，只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来考量。我们知道，无论是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还是农民现代化，都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服务于农

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的农民组织必须同时具备三种功能：一是促进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二是促进农村社区建设；三是促进农村社区治理。这是由中国现阶段的城乡二元国情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在第二阶段需要的农民组织是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农民组织。而符合“三位一体”原则的当然不是“公司+农户”，而是“以土地合作为核心”或“以金融合作为核心”的综合性村社农民组织。也只有“三位一体”的村社农民组织才能同时承担起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三重责任，才能同时兼顾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使命。因此，中国在农业发展的第二阶段，主要的农民组织不是“公司+农户”，而是“农民村社共同体+合作社+企业+农工或农户”，即合作社和公司是在农民共同体内的，而不是将公司和合作社凌驾于农民共同体之上。这又回到了邓小平“两次飞跃”的思想上来了。

讨论到这里，或许依然还有很多人不十分明白为什么要强调农民组织的“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三位一体”功能。这是因为，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城市是国家建设和治理的，而农村过去是、现阶段依然是靠农民自主主导建设和治理，国家予以辅助。我们拿山西的大寨和山西的其他村庄相比较来说明这个道理。大寨在山西是资源匮乏的村寨，由于大寨是以土地合作为核心的综合性的村社一体化农民组织，农民村社共同体同时具备了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的功能和责任，经济发展促进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促进了经济发展。所以，大寨不仅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农民和农村现代化也大大进步了，如村庄的水利、道路、引水、电视电话等基础设施建设，村内的治安、环保、技术服务等基本服务，村民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生活等基本福利都丝毫不亚于发达国家农村农民的水平。而同样是山西的很多村庄，农业条件和煤矿资源比大寨好很多，但由于村社共同体解体了，煤矿等资源被农民共同体之外的公司主导开发之后，开发成果并没有用于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而是变成了少数人在北京、上海甚至美国的房地产，这对农业、农村、农民而言，不是发展，是掠夺。这样的发展模式下的村庄，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与大寨相比差距会越来越大的。这些村庄由于缺乏“三位一体”的农民共同体组织，即使国家付出更多的资源帮助其发展、建设和治理，效果也是事倍功半的。

1985年以来，小岗村尽管有各级加强领导和大量的财政资源输入，可

一直难以实现小康和自治。如果认真算账，现在的小岗村每年吃国家的“返销粮”远远超过1978年之前的数量，如果全国农村都像小岗村一样依靠国家财政输血建设和发展、依靠上级派驻公务员驻村治理，这是国家和政府不可承受的。而大寨等一批坚持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不断巩固村社农民共同体的村庄，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展现了无穷无尽的活力，将小岗村远远抛在了后面。这是因为大寨、华西、南街等村庄在农业发展进入第二阶段之后，遵循了“技术密集+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的发展规律。而小岗村却身处第二阶段依然在追求第一阶段的发展目标。1985年之后，小岗村依然朝着瓦解村民共同体的方向前进，村民组织化程度进一步降低，村民适应市场的能力逐步下降，尽管粮食等农产品产量不断提高，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还是增长缓慢，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不得不完全依赖外部资源输入。1985年之后，小岗村依然作为全国的典范，既是小岗村的悲剧，也是全国众多学习小岗村（进一步瓦解村社共同体经济基础）的村庄的共同悲剧。将小岗村纳入邓小平“三农”理论体系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小岗村的悲剧，实际上是背离邓小平“小岗村过渡论”、“两次飞跃”论的悲剧。

在1985年之后，大寨维持村社共同体体制，并且不断与时俱进——适应市场经济，成了中国第二阶段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旗帜。今日之大寨，实际上是实践邓小平“两次飞跃”论的典型。全国现在有数千个实践邓小平“两次飞跃”论的村社，都是各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实践证明邓小平“两次飞跃”论是正确的。

五

随着全球现代化水平和开放水平的整体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也水涨船高。特别是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很多地方的农业和农业的某些领域已经进入高度发展和高度竞争阶段了（如养猪业高度发展，80%的农户被排斥在养猪业之外了），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为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农业是以打垮竞争对手、永久占有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为发展目标的新阶段。在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农业市场主体占有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无论是在抢占国内市场份额上或是在抢占国外市场份额上，往往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是地区战略或国家战略的一部分，这背后还往往隐藏着农产品武器化的国家战略意图。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国农业

集团成功抢占中国大豆及其加工品市场份额并控制中国大豆及其相关产品的定价权的案例。到今天中国人才彻底明白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为什么坚持中国必须开放大豆市场，为什么要全面收购中国大豆加工企业，为什么不放弃农业的高补贴政策。这是美国农业集团因为追求中国大豆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的需要，也是美国农产品武器化战略的重要步骤。美国占有中国农产品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的步伐并没有停止，美国农产品武器化的步伐更没有停止，下一个是什么？是种子？玉米？棉花？奶？……我们虽无法判定，但不得不警惕。

在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农业发展目标是追求市场份额收益和定价权收益，农业政策要点是“技术密集+组织密集+资本密集+品牌密集+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补贴）”。

在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阶段，“刘易斯拐点”后的劳动力价格加速上涨，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加速转移不可阻挡，“组织密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农民共同体是进一步巩固还是瓦解呢？是公司制度主导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还是农民村社共同体主导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呢？

常见的判断是：农业发展的第三阶段应该是资本大规模下乡的阶段。但中国可能有不一样的选择。这是因为全球化出现了“中国拐点”。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制造业是全球梯度转移的。在全球制造业由亚洲“四小龙”转入祖国内地之后，全球制造业出现了“中国拐点”——少数人为多数人搞制造逆转为多数人为少数人搞制造。亚洲“四小龙”搞制造时，100元国内生产总值可以转化为国民收入70元；中国搞制造时，100元国内生产总值转化为国民收入只有30~40元了。在“中国拐点”出现之后，中国依靠出口导向工业化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道路走不通了。中国搞了20多年的出口导向工业化，农民并没有减少，由7亿增加到了9亿多。每一次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都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在中国，减少农民越多，工人（农民工）问题越严重；工人（农民工）返乡越多，农民问题越严重。这就是我经常说的“中国难题”。

中国不能走亚洲“四小龙”之前所有先发国家和地区转型成功的老路。中国必须走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道路，至少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在未来很多年，中国不仅依然有数亿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

将大规模长期存在，因此，“三位一体”的农民共同体不仅不能瓦解，还要进一步加强；第二，农业和农村经济要养活数亿农民和农村人口，农民村社共同体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主体的地位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第三，必须加强农民生产合作社与城市居民消费合作社的联盟关系，既帮助稳定农民生产合作社的市场份额收益，又帮助城市居民实现“菜篮子”“米袋子”供给安全和价格安全；第四，要形成农民共同体主内、龙头企业主外的合作关系，稳定农民村社共同体国内土地密集型农产品市场份额收益和海外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市场份额收益；第五，国家要加快中心村和小集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步伐和力度，以适应农民自然村社共同体向中心村社共同体转变的要求，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

以华西、永联、周家庄等为代表的农民村社共同体，遵循第三阶段的发展要求，共同体不断壮大，适应市场经济和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不断加强。代表了未来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在“中国拐点”出现之后，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的中国化实践必将深入下去，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现代化之路也必将对中国之后实现现代化的所有国家产生启示性、示范性的作用。

六

读《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后要说的话很多，但序言中要装的内容是有限的。思绪必须收回到张晓雯女士的新书《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上来了。张晓雯女士花费大量心血，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与发展，分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在指导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大作用和历史影响。《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对于我们科学认识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60年间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坚定新农村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对中国未来30年的“三农”现代化实践非常有意义。在中国“三农”现代化正处在三岔路口的时候，张晓雯女士《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的出版正当其时。

李昌平

2010年12月17日于北京

前言

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民大国。农业、农村、农民是“三位一体”的概念，农业是农民和农村的主业，农村是农民和农业的地域，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内在联系、唇齿相依的整体关系，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彻底解决，都依赖于另外二者的互动。有了农业的发展，才有农村经济的繁荣；有了农村经济的繁荣，才有农民的安居乐业。所以，有“农业兴，百业兴；农村稳，天下稳；农民富，国家富”之说。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一些学者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过程中，依据我国的特殊国情，把农村问题分解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分门别类进行探讨，不断加深和强化对“三农”问题的研究。1991年11月29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第一次将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起来提出问题。1993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更加明确地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定的提法提了出来。自此以后，“三农”问题成为一个受到高度关注的特定理论研究对象。近年来，更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历来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整体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如果疏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至终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注与论述，我们就无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何以会把当时工业不发达而农业人口占多数的落后的德国看成是“更加肥沃的革命土壤”。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

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品质指引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是新中国成立60余年来共产党人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60年，栉风沐雨阔步向前；60年，中华大地沧桑巨变。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各时期中央主要领导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三农”具体实践，在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三农”理论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并在其指导下使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几经调整“三农”政策，领导亿万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胆改革、积极探索，不断推进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农业和农村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全面繁荣，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生活显著改善，为实现全面小康、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时至今日，“三农”现状依然令人忧虑，这就是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城乡发展失衡仍然突出，最需要统筹。面临着一系列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新情况、新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以及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我国是世界上农村人口最多的农业大国，邓小平在1987年指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①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曾说：“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一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得农村者得天下。”“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赢得农村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7。

的支持，那就国无宁日。”^① 因此，对我国来说，“三农”问题能否解决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抓住了农村这个大头，就能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主动权，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政局的稳定。新民主主义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是这样。历史和实践都反复证明，农业和农村发展了，整个国民经济才能保持健康快速发展；农业和农村出现了问题，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没有农业的牢固基础，就不可能有我们国家的根本独立；没有农业的积累和全面进步与发展，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全面进步；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② 可以说，“三农”问题解决之日，就是中国现代化实现之时。

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凸显，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三农”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正如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过去，并不跟随着时间一同消逝，都有其现代的延续。今天的中国是过去中国之发展。经济学家熊彼特曾说过：“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③ 对于今天“三农”问题的形成原因，既有历史因素的积淀，又有其现实的原因，既有其内部因素又有其外部因素，对此必须持全面的视角予以把握，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内部，而忽视外部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能仅仅看到导致“三农”问题产生和发展的现实性因素，更要有宏观的历史性视野，从其产生的深远历史背景予以全面考察，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启迪。共和国诞生后，在国家面临着巩固政权、治愈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业的紧迫任务及农业要发展、农村要进步、农民要富裕的背景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为指导，以苏联为鉴戒，对解决“三农”

① 塞缪尔·P. 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北京：三联书店，1989：266-267，403.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18.

③ 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1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9.

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毛泽东“三农”理论。其主要内容有：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走合作化道路；按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就是工业，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坚持人民公社制度，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倡导科学种田；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求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改造自然的斗争；等。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农业观、农村观和农民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上述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理论，在实践中有的未得到很好的落实，有的反而得到了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无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在“三农”问题上的很多认识和实践，为今天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即使其“沉痛的教训”也给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昭示了新的契机。可以说，毛泽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认识和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理论，集中了同时代理论家和实践者在此问题上全部的正确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欠缺，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继者。半个世纪以来，我们解决“三农”问题的结果，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陷入的困境，都可以从毛泽东对“三农”的认识和对“三农”问题解决的思路上得到启迪。因此，继续深入探讨毛泽东“三农”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避免而且日显重要的课题。

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农村改革的战略思想，他以农业发展为中心、农村改革为起点、农民富裕为目的“三农”理论对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邓小平一生十分重视“三农”问题，他在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并在继承毛泽东“三农”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结束了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体制；推进了农村市场流通体制改革；突破了“以粮为纲”的单一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带动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变革和小城镇发展，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

化和城镇化道路；提出了农业改革与发展要有“两个飞跃”的科学论断等。这些根本性变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带来了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

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这十三年，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作指导，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三农”理论的基础上，针对国际新局势和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新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总结党领导农村改革的经验，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理论：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强调从政治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坚持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建立三个支撑体系；加快小城镇建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动科教兴农，实现“两个转变”；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条件，增加农民收入；等。这些理论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更好地做好农业、农村、农民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及在此前提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目标的要求，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新阶段的实际出发，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指导“三农”工作的思路不断创新和丰富，对“三农”问题重视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明确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一系列基本方针，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任务；连续出台了八个中央“一号文件”，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专门就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重大部署，形成了新时期比较完整的“三农”工作指导思想和政策体系。这些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

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重大决策，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关于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思想的重大发展，是对新时期“三农”问题认识的升华和飞跃。这对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系多年历史积重所生，从2600年前开始征缴农业税起，历朝历代均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仅就当今“三农”问题而言，这是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乡经济社会变革不同步造成的结构偏差问题，本质成因至少涉及国家工业化战略长期“工占农利”、城乡二元社会矛盾、工业化与城市化互相脱节、农地制度设计欠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困惑、乡村自治民主政治制度发育迟缓等问题。其复杂性、严重性和化解的艰巨性，堪称世界之最，现已构成改革与发展中的最大难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今天的“问题”连接着昨天的“原因”，明天的希望来源于我们对昨天的科学认识和对今天的正确把握。据此，本书以时间为经，以史实为纬，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基本勾画出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经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乃至我国随后的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理论的发展脉络。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及其实践研究方面，实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以期对新时期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制定农业、农村和农民政策时，能起到“以史为鉴”的效用。

中共四代领袖的“三农”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中国化的结晶，其内容博大精深，当深入到需要用综合研究的方法来把握其统一性和整体性时，笔者深感材料占有的不足和自身学识涵养的欠缺，有一些看法可能不很成熟，或有不妥之处，还恳请专家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作者

2010年10月于成都